

【论 文】

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精英： 理解中国从“天下帝国”到“民族国家”进程的钥匙

马 戎

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是一个最为辉煌的年代，在“百家争鸣”的思想争论中逐渐浮现出了古代中国政治建设的宏大框架，为中华文明在其后三千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诸多学者们在哲学、政治体制、社会组织、思想伦理、法律、军事等许多领域提出的思想，至今仍然深深扎根在中华大地，启发着人们的思考与政治智慧。

从秦汉直至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政治理念和行政体系，可以大致以“大一统”的“天下帝国”来表达。“与西方语境中的‘帝国’(empire)概念不同，‘天下’这一中国传统概念表达的与其说是关于帝国的概念，还不如说是关于帝国的理念”(赵汀阳, 2005: 40)。中国人思想中的“天下”是以中原皇朝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一个完整的世界体系¹，而西方世界的古代史和中世纪史大多是几个帝国对峙的历史。在中国人的“天下观”中，其基本框架就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天下为一，诸侯为臣”(《荀子》)。这个“天下”体现的是中华文明之孕育发展的地理空间和当时人们对世界的基本知识。中华各族繁衍生息的东亚大陆在生产力水平低的古代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费孝通, 1989: 2)。“天下帝国”概念的产生，与这个四周有自然屏障的地理空间密切相关。这个地理单元“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民族格局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费孝通, 1989: 2)。

在这个地理单元内部，又可分为“核心区”和“边缘区”，而且核心区之所以成为核心区，边缘区之所以几千年仍然是边缘，这又与它们各自的地理自然特征密切相关。自秦统一六国后的各个朝代里，核心区始终是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通过人口迁移和新农业区的建立，帝国的核心区从黄河流域逐渐扩展到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同时核心区与边缘区的行政体制通常存在明显的差别，核心区实行郡县制(行省制)和中央集权制，边缘区实行各种形式的世袭部族首领自治制度。这种世袭部族首领制度，与中亚地区和中世纪东欧的“部族社会”有许多的相似之处。特别是部族民众的认同体系和效忠对象，与核心区的中央集权、皇帝集所有权力于一身、全体臣民效忠“天子”的体系是很不相同的。在传统中国这个“天下帝国”中，各个朝代在不同程度上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核心区”和“边缘区”并列的“二元结构”，边缘区的部落首领和民众并不熟悉也不接受核心区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皇帝和朝廷是二者的连接点和共同接受的最高权威。

在文化模式和认同意识方面，核心区被认为是代表“中原文明”的“华夏”，而居住在边缘区、具有与中原不同经济类型和文化特征的群体则被核心区的中原人称作“蛮夷”。在“有教无类”传统的影响下，正是“变夷为夏”的“教化”过程使部分边缘区最终转化为核心区。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夷夏之辨”的核心并不是体现于体质、语言等方面的差别，而主要指以价值观念、

¹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天下/帝国根本上就不是个“国家”，尤其不是近代自欧洲输入的“民族国家”式的政治实体，“而是一种政治/文化制度，或者说是一个世界社会”(赵汀阳, 2005: 44)。



行为规范为核心的“文化”方面的差别。美国学者费正清指出，“毫无疑问，这种认为孔孟之道放之四海皆准的思想，意味着中国的文化（生活方式）是比民族主义更为基本的东西。……一个人只要他熟习经书并能照此办理，他的肤色和语言是无关紧要的”（费正清，1987：73-74）。其它学者强调指出，“在儒家思想中，‘华’与‘夷’主要是一个文化、礼仪上的分野而不是种族、民族上的界限。……所谓中国有恶则退为夷狄，夷狄有善则进为中国。……华夷之辨并不含有种族或民族上的排他性，而是对一个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认识和区分”（张磊、孔庆榕，1999：285）。

因此，凡是接受中原文化的族群，尽管其外貌特征与语言习俗可能与中原存在差异，但仍可被视为“华夏”，而尚未接受中原文化的族群就被视为“夷狄”。因此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国家，中国这个国家不同于近代任何其他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而“是一个以文化而非种族为华夷区别的独立发展的政治文化体，有者称之为‘文明体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它有一独特的文明秩序”（金耀基，1999：614）。因此，华夏和蛮夷之间是一个动态的辩证关系，用于区别两者的是“教化”程度即接受中原文明的程度。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东亚大陆边缘区的这些“蛮夷”，也始终把自己放在“中国”这个“天下体系”当中寻求生存与发展，始终存在着强大的向心力。

边缘区各“蛮夷”首领的地盘和实力是互有差异的，当核心区的中央皇朝强大之时，他们俯首称臣，朝贡纳税，而当中央皇朝衰弱之时，边缘区比较强大的族群就会择机内侵，逐鹿中原，试图使自己成为中央皇权，改朝换代。五胡十六国、南北朝、蒙元皇朝、明清皇朝等即为蛮夷成功进入中原的代表时期。中原地区繁华的都市、兴盛的农业、庞大的人口、发达的文化生活都对边缘区的蛮夷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因此，在这些边缘地区的蛮夷部落一旦成功入主中原之后，也就不可避免地迅速融入中原文化和人口之中。

作为以东北地区的蛮夷入主中原的明清皇朝，在边远地区的势力扩张方面比较积极，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通过各种征伐与怀柔政策把西北、西南大块边缘地区纳入朝廷的管辖范围。清朝参照各地的传统，实行了“多元式天下”的统治模式，除了明清“龙兴之地”的东北地区外，清朝在蒙古、西藏和新疆分别实行不同的行政和法律体系，客观上阻碍了这些边缘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融合（王柯，2003）。

鸦片战争及以后几次抵抗列强侵略的对外战争中，中国这个传统的“天下帝国”被外来的帝国主义军队彻底打败，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亚洲殖民地的攫取直逼中国边境。北方的沙俄占领西伯利亚和中亚，东方的日本占领了朝鲜、琉球和台湾省，南方的越南等被法国占领，西南的印度、缅甸等地被英国占领，而且这些帝国主义国家进一步的攫取目标，十分清楚地指向中国的边缘地区（东北、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地）。在这个救亡图存的历史关头，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天朝秩序”已不可能再继续维持，这个“天下帝国”在四周强敌逼迫之下只能一步一步极不情愿但又十分无奈地朝着“民族国家”的政权形式与社会结构逐步转型。“中华帝国历来是一个多民族的世界帝国，在清末强被纳入‘民族国家’这件紧身衣”（孙隆基，2004：21）。边缘地区各部族也被列强冠之以“民族”（nation）的名号，鼓动他们从中华帝国中分裂出去，传统的“华夏-蛮夷”框架已被外力打碎。李鸿章所谓“三千年之一大变局”，其所指的正是这一中国国家体制的根本性转变。

当“天朝”在对外战争中屡屡败绩，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权势日衰的大环境下，中国各边缘地区的“蛮夷”部落必然会思考自己今后的地位与权益将如何加以维护的问题。与此同时，他们的首领人物即部族精英们也在不同程度上开始接触来自欧洲的“民族”概念和接受“民族自决-民族独立”政治理论的影响，他们和他们所属的部族在这样的政治大环境下面临多种选择。其中有些部族（如蒙古科尔沁部）的首领世代享受清朝皇室的厚恩，始终坚持拥

戴清朝；有些部族首领在外国势力的鼓动下开始试探从清朝分裂出去，转投某个列强的门下，并依仗外国支持寻求“独立”。在这样的“大变局”之下，这些部族（其中许多在1949年以后被政府识别为“民族”）首领和接受现代学校教育的青年精英必然受到各方势力的影响而出现政治分化，他们需要在效忠中国中央政府还是依靠外国寻求独立之间做出选择，或者犹豫徘徊于两者之间。这一政治分化在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皇朝后变得更加清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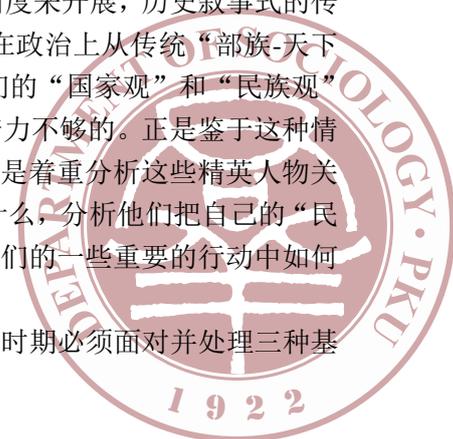
那么，在这一国家政治结构急剧转型的过程当中，哪些部族的首领和精英人物坚持对中国的政治认同、始终效忠于中央政府？哪些部族的首领和精英人物开始对中央政府耍两面派、暗自筹划独立？哪些部族精英集团因内部意见不统一而发生分裂？在当时的政治情境下，影响这些精英人物分化路径和政治选择的因素都是什么？以上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必须弄清楚的核心问题。从我们所读到的研究文献来看，研究者们大多还是从中央政权的视角居高临下地分析和解读当时民国中央政府（北京的北洋政府、南京的国民政府）的政治宣言、政策文本、档案资料、主要官员的回忆录等等，同时论及当时中央政府与边疆部族首领之间的互动，但是至今很少有研究者把目光主要放在边疆部族精英人物的思想演变和政治谋略方面，采取“换位思维”的研究方法，尝试着站在这些精英人物的立场来思考和分析问题。毫无疑问，在核心区的中央政府与边缘区的少数民族首领和精英人物的双方互动过程中，中央政权的政策和做法是必须研究的，但是如果忽视了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精英人物思想与行为的研究，那么，对这一互动过程的研究就是不完整的。

从这个多方互动的视角来看，分析清朝晚期和民国时期中国边疆一些少数民族的首领-精英人物的思想过程和政治选择，对于我们在更深层次上理解在中国从一个传统的多部族“天下帝国”向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族群关系的演变就变得非常重要。一个多部族大帝国，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留原来的版图，是最终解体还是基本保存原有的疆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边缘地区各部族首领在他们与中央政权、外部势力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中最终做出的政治抉择。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把对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精英的研究比喻为理解中国从“天下帝国”过渡到“民族国家”这一进程的钥匙，应当是不过分的。

在中华帝国的边缘地区中，西南的云南、广西、贵州建省设县较早，不同族群长期混杂居住，政治离心力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而西藏、新疆、青海、内外蒙古、满洲（东北）这五个地区在清朝的行政管理体制中是与核心区距离较大的，外部势力在鼓动这些地区部族分离方面所下的功夫也最多，因此也最需要我们开展研究。近年来，已经陆续出版了一些以西藏上层集团主要人物（牙含章，1963；1987）、青海宁夏回族军阀（杨效平，1986；吴忠礼、刘钦斌主编，1993；丁明俊，2001；许宪隆，2001；师纶，2006；陈秉渊，2007）、内蒙古上层精英和领袖人物（札奇斯钦，2005；《乌兰夫传》编写组，2007）、新疆地方汉族军阀和“三区革命”（张大军，1980）等为对象的研究成果，但是对清末民国时期新疆、内蒙古和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精英人物的专题研究相对较少，对马家军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步芳和马福祥两个人。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少数民族精英人物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开展，历史叙事式的传记类研究固然是需要的，但是当我们的关注点是当时边疆地区社会在政治上从传统“部族-天下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型时，对于这些历史人物的分析重点就是他们的“国家观”和“民族观”的形成与演变。从这个视角来看，以往的大多数研究在这个方面是着力不够的。正是鉴于这种情况，本次笔谈组织的三篇文章，在研究视角上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即是着重分析这些精英人物关于现代“民族”（nation）和“（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观念是什么，分析他们把自己的“民族”和中国整体、中央政府放在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框架内，以及在他们的一些重要的行动中如何体现出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对中央政府的态度。

对于这些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领袖人物来说，在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必须面对并处理三种基



本关系，这三种关系都与他们心目中的“国家观”、“民族观”密切相关。

第一，是如何处理地方政权与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在清朝的“多元式天下”的统治体制下，这些部族的王爷、土司、噶伦、伯克、头人长期在自己的管辖区域内拥有一定的自治权。在皇朝衰败、民国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下，这些少数民族首领面前有两种选择：一是坚持扩大自己的自治权，并在外力支持下谋求政治分离；二是继续效忠中央政权，争取在新的国家体制下以中央任命的职位来保持对地方政治和各种事务的影响力，他们作为地方统治者的合法性依然来自中央政权的任命。第一种选择的危险是面临中央政府的武力征伐，所依赖的外部势力在危急时刻并不可靠；第二种选择也使他们面临失去权力的某种风险，因为存在随时被中央免职并被他人取代的可能性。在一个单一制而非联邦制的国家中，“地方服从中央”是一个基本准则。他们最后的选择究竟是什么，传统的向心力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取决于中央政府和这些部族精英的个人政治智慧。

第二，是如何处理当地各族群间关系的问题。我国许多边疆地区都是多族混居地区，各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首领和某种自治传统，在历史上即形成了某种多层次的权力结构。如果在一个地区占主导的部族首领在自己的管辖区域内对其他群体实行歧视、压迫的政策，必然恶化族际关系、激发民族冲突，也会引发该地区与中央政府和邻近地区之间的矛盾。如青海的马麒、马步芳父子就面临如何处理与协调当地藏、汉、回、蒙等各族之间关系的复杂问题。

第三，是如何处理不同宗教和不同教派之间关系的问题，在中国的许多边远地区居住着各自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族群，甚至一个宗教内部还存在不同教派（如伊斯兰教中的派别和不同门宦、藏传佛教中的不同支系等），如果对居民中的伊斯兰教、藏传佛教、汉人民间宗教、萨满教等不能一视同仁，也会引发教民之间的矛盾和宗教冲突。

此次笔谈中的三篇文章各自关注的是不同地区中的不同人物，但是都分析了当地少数民族精英人物在“国家观”和“民族观”方面政治理念的演变和他们行动对当地社会的影响。

第一篇常宝的文章以清末民国时期蒙古地区的社会变迁作为大的历史背景，回顾了内蒙古行政体制演变的历史，蒙古族王公和精英人物受到现代“民族”、“国家”概念影响后出现了“现代性”叙述和“传统性”叙述这两类倾向，在拥戴清朝、接受共和、寻求独立这几种选择中出现了分化。这篇文章生动地描述了各地蒙古王公和精英人物在民国这一历史转型期中表现出来的在国家认同方面的混乱与多元。

第二篇关凯的文章“满族民族性：帝国时代的政治化结构与后帝国时代的去政治化结构”虽然并没有涉及到具体的满族精英人物，却是以满族的“国家观”、“民族观”的演变为主线，对满族作为一个群体在历史上如何形成、八旗制度和事实上的满汉融合进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同时也与近年来西方学术界的所谓“新清史”著作提出的观点进行了对话和讨论，最后以“民族主义话语中的满族镜像”为题探讨了清朝末年的满汉关系并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满族“民族意识”的再现进行解读。

第三篇菅志翔文章的研究对象是以往研究相对较少关注的青海马家军阀的创始人马麒。处在青藏高原、河西走廊、陕甘平原、蒙古草原之间的青海，自身既是民族混居、宗教交错的“边缘区”，同时也是西部几个边缘区之间的结合部，马家军阀牢牢地占据青海 40 余年，必然有其深层次的原因。而马麒恰恰就是解读这段历史的重要人物。正如文章所说“马麒一生正处于百年巨变的中间时段，经历了西北‘回叛’、庚子之役、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四个近代中国史上的重要时期，其身份也一个接一个，从‘河州回贼’到‘朝廷命官’，从‘前朝之臣’到‘光复大员’，从‘光复大员’到‘地方政要’，再从‘地方政要’到‘党国中坚’（新建之青海省省长），走马灯一样不间断地转换。这些身份以及与这些身份相关联的社会互动，实际上涵盖了那个重要的历史时段中发生的几乎所有重要进程”。文章从几个关键的关系处理入手，特别是当时各族各方对马麒的评价，生动地展示了这个“有着多重身份的历史行动者”是如何在处理中央和地方、地方社

会内部及其各个族群之间的互动，“进而探究在内部中央政权影响衰微乃至解体，外部分化力量影响甚强的情况下，是什么力量仍然发挥作用维护着中华的统一，是什么样的机制和过程决定了今天的中华民族能够比较完整地继承帝国的历史认同和政治版图”。

也许多少有些巧合，以上三篇的作者分别是蒙古族、满族和回族，他们都毕业于民族社会学专业，在内蒙古、东北和青海等地都进行过多年的社会调查，对西方和国内的相关研究文献也比较熟悉，这使他们的研究视角和比较分析都有大量实地研究为基础，同时有与学术前沿话语对话的意识。从这三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谈到的与“国家观”、“民族观”相联系的三个关系是如何在这三个地区具体展开的，而少数民族精英人物在历史进程中又是如何思考和行动的。当然，由于篇幅所限，许多有民国民族史相关的领域和专题在这三篇文章中没有涉及到，但是这三篇文章至少提出一些新的研究视角可供未来的研究者参考。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天下帝国”转型为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民族国家”，边缘地区的各个部族在 1949 年以后被“识别”为不同的“民族”，这些边缘地区也被“自治地方化”了，人民政府政府采用了一套新的制度（“民族院校”）来培养少数民族的精英。那么，今天这些年轻的民族精英们是如何树立自己的“国家观”和“民族观”的？他们如何看待清末民国这个历史时期的民族关系？他们是否会延续当年本族精英人物的基本立场来进一步推进中华民族的民族构建（nation building）？这些都是需要经过深入调查才能够回答的问题。而与各族青年知识分子一起来回溯中国近代史和民国时期的民族关系史，以史为鉴，我相信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参考书目：

- 陈秉渊，2007，《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 丁明俊，2001，《马福祥传》，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 费孝通，1989，“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第1-19页。
- 费正清，1987，《美国与中国》（John King Fairbank, 1980,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4th ed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北京：商务印书馆。
- 金耀基，1999，“中国的现代文明的秩序的构建：论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潘乃穆等编《中和位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613-627页。
- 师纶，2006，《西北马家军阀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 孙隆基，2004，《历史学家的经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王柯，2003，“国民国家与民族问题——关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问题的历史思考”，《世纪中国》2003年7月11日。
- 《乌兰夫传》编写组，2007，《乌兰夫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 吴忠礼、刘钦斌主编，1993，《西北五马》，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 许宪隆，2001，《诸马军阀集团与西北穆斯林社会》，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 牙含章，1963，《达赖喇嘛传》，北京：人民出版社。
- 牙含章，1987，《班禅额尔德尼传》，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 杨效平，1986，《马步芳家族的兴衰》，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 札奇斯钦，2005，《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 张大军，1980，《新疆风暴七十年》，台北：蘭溪出版社。
- 张磊、孔庆榕主编，1999，《中华民族凝聚力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赵汀阳，2005，《天下体系》，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